

中西教育文化比较研究

袁长青 著

Comparative Study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Educational Cultures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中西教育文化比较研究

Comparative Study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Educational Cultures

袁长青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西教育文化比较研究 / 袁长青著. --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8. 10

ISBN 978 - 7 - 5201 - 3438 - 5

I. ①中… II. ①袁… III. ①教育学 - 文化学 - 对比研究 - 中国、西方国家 IV. ①G40 - 0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09911 号

中西教育文化比较研究

著 者 / 袁长青

出 版 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周 丽

责任编辑 / 王玉山 肖世伟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经济与管理分社 (010) 59367226

地址: 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 100029

网址: 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18

印 装 / 天津千鹤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19.75 字 数: 292 千字

版 次 / 2018 年 10 月第 1 版 201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201 - 3438 - 5

定 价 / 79.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读者服务中心 (010 - 59367028) 联系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本书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外国文学文化研究中心研究成果

Contents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节 研究的缘起及意义	1
第二节 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10
第三节 内容框架与研究方法	24
第四节 研究创新与局限	28
第一章 核心概念、理论基础与价值取向	31
第一节 核心概念的界定	31
第二节 理论基础	41
第三节 价值取向	45
第二章 中国传统教育文化的变迁及其特征	53
第一节 何谓中国传统教育文化	53
第二节 中国传统教育文化形成的社会基础	55
第三节 中国传统教育文化的历史变迁	62
第四节 中国教育文化传统的总体特征	85

第三章 中国近现代教育文化的变迁及其特征	96
第一节 清末崇实教育文化时期（1840 ~ 1911 年）	96
第二节 国民教育文化时期（1912 ~ 1949 年）	106
第三节 社会主义改造和探索时期（1949 ~ 1978 年）	122
第四章 西方教育文化的变迁及其精神内核	129
第一节 西方教育文化形成的社会基础	129
第二节 西方教育文化的历史演变	136
第三节 西方教育文化的精神内核	168
第五章 中西方教育文化比较	179
第一节 中国传统教育文化的控制之道	179
第二节 中国教育文化中的反控制力量	190
第三节 西方教育文化的自由之路	202
第四节 中西教育文化比较	217
第六章 当代中国教育文化反思与重构	229
第一节 当代中国教育文化反思	230
第二节 中国教育文化重建	244
第三节 中国教育文化展望	260
结 语 人的自由与尊严是教育文化的最高价值	285
参考文献	296

绪 论

第一节 研究的缘起及意义

一 研究的缘起

本书的写作缘起于笔者对 20 世纪国内两次“文化热”的思考，以及对中国教育问题的深切关注与觉思。

（一）对两次“文化热”的关注与思考

20 世纪初至中叶，文化研究曾在中国风行一时，50 年代以后日渐式微。80 年代初期，时值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大转型，文化研究再度勃兴，以文化为中心的研究范式一度成为学术界的新宠。乘着这股东风，中国大陆掀起一波反思和批判传统文化的浪潮，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以此为主题的电视系列片《河殇》，此片一经播出，举国沸腾，并由此引发了一场有关“海洋（蓝色）文明”和“大陆（黄色）文明”的争论，论战之激烈，实为少见，文化之热，可见一斑。时逢国门初开，西方各种思潮蜂拥而至，出版界呈现出一派兴盛景象，加上知识精英不遗余力地宣讲，整个中国社会仿佛处于文化大变革的前夜。虽然由于缺乏政治与经济的配合，这场文化变革最终成为一支难以为继的孤军而功败垂成，但它对国人的思想启蒙作用仍不可低估。

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文化热”再次以另一种姿态横空出世，具体表现为官方、学界和民间三方的合力推动，但

是其主旨已与 80 年代那次“文化热”大相径庭。这次“文化热”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不再执着于反思而是加以推崇，不再一味批判而是大力弘扬。知识精英与主流意识形态密切合作，致力于发掘儒家思想的现代价值，试图寻找儒家治国理念与现代政治伦理相契合的成分，并将之运用于现实的政治格局之中。譬如，把“以德治国”“科教兴国”写进政府文件并加以宣示；对内开设国学院，主张尊孔诵经，对外开办孔子学院，宣讲儒家文化。在这场传统文化的“复兴”运动中，一部分中国知识精英在对待西方文化方面首鼠两端，甚至沿袭清末“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腔调，割裂了西方文化的整体性，只取其表，不及其余。更有甚者，以一副文化自负的姿态宣告西方文明的腐败与没落，预期中华文明将取得最终胜利。他们宣告：“当今全世界文化的冲突、邪教的泛滥、宗教的极端、自然的破坏、人性的恶化、科学的负面性等，都是社会安定和发展的阻力。然而要消除和解决这些问题和矛盾，中华文化具有西方文明无法取代的作用。”^① 此情形类似于 1935 年王新命、何炳松等 10 名教授联名在《文化建设》杂志第 1 卷第 4 期上发表的《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即所谓的“十教授宣言”。虽时隔 66 年，然其口吻与观点如出一辙。这种缺乏严谨、科学精神的“宣言”，是一种典型的浮文，也是中西文化折中论的另一翻版。更有一批学者避开西方文明中具有进步意义的核心价值不谈，运用汉语的模糊性对西方文明中的许多关键词有意无意地进行曲解。如“自由主义”被曲解为“自由散漫”和“无组织无纪律”的代名词，“民主”被简单地解读为“人民当家作主”，“个人主义”的内涵变成了“唯我独尊”和“利己主义”等。这种做法直接导致了国人对西方文明的误读，影响深远，其后果尤为严重。

这场复兴传统文化的运动，虽然在客观上起到了保护、普及和推广中国传统文化的作用，但是，其表现出来的心态则是不正常的。正如陈占彪所言：“传统文化之复兴其实正是全球化日益深化的今天我们被迫采取的一种

^① 张岱年等 76 名中华文化研究者：《中华文化复兴宣言——为促进新世纪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世界和平与发展而奋斗》，<http://www.hhfg.org/fjywh/f608.html>。

自我应对之举、表面上的理直气壮和自信，其实正是内心焦虑不安的外化。”^①事实上，无论现代儒家学者们如何努力，其撷古附今的说辞更像是郢书燕说，难以为时下社会、政治、经济、教育中出现的种种顽疾开出良方。在此情势下，这场所谓的传统文化复兴运动免不了“虎头蛇尾”，草草收场。

通过考察这两次国内“文化热”的成败得失，引发了笔者对中西文化融合之路的思考，这成为本书写作的缘由之一。

（二）对中国教育沉疴的觉思

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笔者长期关注中国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问题，先后阅读了何博传的《山坳上的中国：问题·困境·痛苦的选择》^②（1989）、杨东平的《教育：我们有话要说》^③（1999）、冉云飞的《沉疴：中国教育的危机与批判》^④（1999）以及刘道玉的《中国教育反思录》^⑤（2012）等一系列反思中国教育的历史与现状的书籍，由此对中国教育存在的种种问题有了清醒而深刻的认识。综观当前，中国教育在取得卓越成就的同时亦衍生出诸多弊端，举其要者列举如下。

从制度的构建上看，中国教育至今没有形成与现代政治经济相匹配的新的教育机制。在人才培养模式、考试招生制度、办学体制和管理体制等方面，仍保留着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烙印，存在教育的体制机制统制过多、行政化严重，教育资源失衡，教育机会不均，大学精神贫乏，高等教育质量整体上有待提高等诸多问题。

从教育文化建设方面看，教育的功利化倾向日益严重，教育应有之理

① 陈占彪：《20世纪90年代以来传统文化热之考察》，《湖北社会科学》2007年第4期，第101页。

② 何博传：《山坳上的中国：问题·困境·痛苦的选择》，贵州人民出版社，1989。此书第十二章“教育的困境”较早地指出了中国教育面临的问题。

③ 杨东平：《教育：我们有话要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此书选编了80余名人士对中国教育问题的观察、思考、批判与建言，其中许多问题到现在也没有得到解决。

④ 冉云飞：《沉疴：中国教育的危机与批判》，南方出版社，1999。作者自认为在本书中是以一个公民的身份对中国教育问题做出常识性的表达。

⑤ 刘道玉：《中国教育反思录》，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2012。此书作者为武汉大学前校长，主要反思当下中国高等教育存在的种种弊端。

想、良心与社会责任被削弱；教育之“尚善”精神贫乏，少有“人的目的”的思考；教育缺乏“精气神”，教育风尚庸俗化，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学而优则仕”“读书做官论”等尘嚣甚上，符合新时代新型教育文化远未形成。

从教育改革的实践层面看，改革开放 30 余年，教育改革虽一直没有停止过，但由于教育本身的内在保守性和现实境遇的不尽人意，加上沉淀在国人身上一千多年来的“科举”情结，导致无论是 20 世纪 80 年代教育界掀起“素质教育”的改革浪潮还是 20 世纪末推行的新课程改革，都始终摆脱不了应试教育的桎梏，各种举措与行动更多地在外围打转，而没有触及教育之本质与核心。

以上问题的形成，都基于这么一个背景：长期以来，教育的主体性被贬斥，超越性被尘封，教育的功利性与适应性得以张扬，导致教育文化正气不张，世俗流弊侵蚀其间遂致百病丛生。顾明远先生说：“教育犹如一条大河，而文化就是河的源头和不断注入河中的水。研究教育，不研究文化，就只知道这条河的表面形态，摸不着它的本质特征。只有彻底把握它的源头和流淌了 5000 年的活水，才能彻底地认识中国教育的精髓和本质。”^① 文化既是教育之基础，亦是教育之意义所在。中国教育改革亟须进行深层次的文化变革。只有教育文化的革新，才能促使教育哲学、教育思想、教育理念、教育方法、教育制度和教育体系的与时俱进、推陈出新，实现教育的真正现代化。

基于此，以文化为基础，以教育为路径，通过回顾中西教育文化变迁之路，检视中国教育文化之成败得失，探究未来中国教育文化之走向，为中国教育改革整体、深入的推进提供文化和精神指引，也成为本书写作之缘由。

二 研究的意义

教育文化的研究意义，主要表现在具有递进关系的四个层面，下一层为上一层的基础，上一层为下一层引发的结果。

^① 顾明远：《中国教育文化基础》，山西教育出版社，2008，第 1 页。

（一）正本清源，为教育文化研究清开道路

任何理论研究，必须建立在严谨、系统的逻辑基础之上，即应遵循所谓的逻辑秩序。对文化及其相关领域的研究，最易跌入空泛或支离的陷阱。例如，目前国内学者对“教育文化”及“教育文化学”就有许多迥然不同的理解，研究对象过于空泛不实，虽然在概念上与西方学者所言的“教育文化”或“文化教育”存在着极大的差异，但在讨论或研究时则混为一谈，导致概念与推理的凌乱不堪。

为避免这一误区，本书试图从三个方面为教育文化的研究清开道路。

（1）对教育文化研究领域经常出现的一些概念进行厘清和界定。文化、教育文化、文化教育、教育传统、传统教育等这些在教育研究中经常出现的名词，必须在特定的语境中使用，否则必致歧义丛生。只有做好定义，方能作为观点的进一步展开划好讨论的域阈。

（2）清晰地表明笔者在教育研究中所采取的价值取向。在教育研究中，虽然不能轻率地对教育活动做出价值判断，以免引起价值泛滥的后果，但众所周知，教育是不能免于无价值的。价值的评判事实上是不可避免的。因而，作为一个研究者，清晰地表明自身的价值取向，可以避免昧于一些基本的价值常识，如在教育实践领域，自愿相比强制，民主相比专制，约束相比放任，赋予相比剥夺，多样相比单一，前者无疑比后者更符合现代社会的价值取向。在这些常识面前，我们不应再费笔墨去争论。

（3）文化相对主义的观点虽然在人类学上有其独特的意义，但在研究中，笔者秉持这么一种观点：种族虽无优劣上下之分，文化却有进步与落后之分。^①对于中西教育文化孰是孰非，孰优孰劣，我们不能轻易下一个结论，因为文化的形成有其历史的必然性。但这并不妨碍在研究中对中西教育文化的特征作一总体的描述，并在此基础上做出哪些特征更符合现代教育价

① 露丝·本尼迪克特在其代表作《文化模式》中，从文化的而非遗传的、种族的角度来解释各群体的差别，在20世纪30年代备受人们欢迎，因为人们不可能改变自己的种族，但可以改变自己的文化，这一解释因显得开明而易被接纳。参见露丝·本尼迪克特《文化模式》，王炜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价值观的判断。这一研究的态度有利于避免文化相对主义在价值选择时的模棱两可与举棋不定。

（二）检视传统，反思现实，促进中西教育文化的融合

人类的文明史，其实就是一部人类不断追求物质丰富与精神自由的历史。在文明演变过程中，作为万物之灵长的人在生产和生活中被深深地打上本族群的文化烙印。不同族群文化之间的冲突、濡化、侵蚀和兼容，构成了一幅精彩纷呈、此消彼长、兴衰相交的宏伟画卷。近代以降，不少东方国家由于国力衰退，文化日渐式微，遂以西方文明为蓝本对传统文化加以改造以期实现文明转型。教育文化作为文化大系统中的子系统之一，也大致经历了此种演变。

1. 基于人性的共通性，对中西教育文化进行比较研究

人性是对人类所共同具有的天然秉性的抽象把握，具有普遍意义。人的天然秉性或天然倾向性并非仅仅指人的自然性，因为人既有作为物性存在和感性存在的天然秉性一面，如作为物性存在的生理功能及其反应，以及作为感性存在的饮食生活秉性、性生活秉性、情绪特质、行为特质等，也有作为理性存在的天然秉性的一面，如思维理性倾向性、自由（创造）倾向性、社会（乐群）倾向性、善恶倾向性、人文倾向性等。时代在发展，科技在进步，但几千年来，人性本身却没有多少变化。所有的教育活动都是针对人的社会实践活动，本质上都事关人性，故一定有其共通的地方，这是各国间教育理论能够相互比较和借鉴的基础。

2. 理清中西教育文化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发展轨迹，探讨中国今后教育文化的走向

中国教育素来以“人伦”和“道德”为中心，逐步形成并强化了以宗族为本位的社会结构。两宋以降，读书人大多走上科举做官之路，“读书做官”成为中国农耕社会的一种教育风尚和读书人的精神皈依，“学而优则仕”的教育价值观沉淀为一种民族的潜意识，其影响延及至今。西方教育从五世纪开始围绕宗教展开。文艺复兴以来，人们开始寻求个人之价值，始得生产力之解放，初步形成以个体为本位的社会结构。历经工业革命之

“人的异化”，再到后工业时代的“人的解放”，教育的个体价值得以进一步确认。那么，面对现代化和后工业文明的挑战，中国教育文化在今后几十年将何去何从？这亦是本书要回答的问题。

3. 冲破教育文化的藩篱，实现交流与融通

一个国家的文化传统必然会在教育上有所反映，尤其对教育思想的影响更大，进而影响到教育的方方面面。只有对文化展开研究才能认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教育的本质。因为文化是一个民族长期的心理、思维和行动习惯的积淀和养成，是一个民族自我认证的标签，一旦形成，就有着很强的稳定性和保守性。任何一种文化模式的形成与发展，均有其特色和先进性，也有其保守性和落后性，教育文化也如此，只有通过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融合，才能达到文化上的融通与圆满。国务院发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扩大教育开放，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借鉴国际上先进的教育理念和教育经验，促进我国教育改革发展，提升我国教育的国际地位、影响力和竞争力”^①这一目标，也是基于这么一种理念。事实上，全球化背景下，人类社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进行跨文化的交流与沟通，强调尊重文化的多样性，跨文化意识愈显重要。在此背景下，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文化有其独特的现实意义。

（三）回归教育的主体价值，培育新型教育文化

中国历经几千年的专制统治，专制主义的气息已渗透进中国传统文化的每一个细胞。虽然辛亥革命后帝制被推翻，但文化基因并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专制主义对政治文化的影响自不必说，对教育文化的影响也是巨大的。这一文化毒瘤不除，中国就无法真正进入现代文明国家的行列。要清除专制主义，其中一个必经途径就是文化启蒙。文化启蒙从教育开始，这是一个漫长而痛苦的过程，其中对教育文化进行改造，实现教育主体价值的回归，培育新型教育文化，是一条虽艰辛泥泞却不可不走的道路。本书拟从两个方面

^①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印发《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的通知（中发〔2010〕12号），2010年7月8日。

对此问题展开讨论。

(1) 回顾中西教育文化变迁的历史,总结归纳出中西教育文化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主要特质及其精神内核,探讨中西教育文化的差异及其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检视其中的成败得失,探寻一种与我国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状态相适应的教育文化,这应当在现有的教育研究框架和思路中得到重视。中国近代历史已经证明,文化观念的革命是所有深层次变革得以展开的关键因素。因而,中国教育文化必须超越传统,勇于革新,吸收人类文明中的普适价值观,摒弃工具主义的教育文化观,建立起具有主体性、民主性和内在性的崭新的教育文化。

(2) 回归教育的主体价值,确立崭新的教育文化价值观。教育本质上归属于文化,基于教育所需而建立的机构本身就是一个文化组织、一个精神主体,它与文化一样,强调的是思想与自由的价值,而非器物与强制的功用。因而,我们有什么样的教育文化,就会造就什么样的文化价值观。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认为,社会的控制力有三个,一个是暴力,一个是金钱,一个是知识。暴力是农业社会的产物,金钱是工业社会的产物,现在知识是社会的控制中心。未来我们的教育应当回归知识、真理的体系,只有让教育的主体价值回归知识本身才能避免陷入被权力支配或被财富殖民的困境。^① 1900年,萨勒德(M. E. Sadler)在题为《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从外国教育制度研究中学到有实际价值的东西?》的著名演讲中,第一次指明了文化研究对比较教育的重要意义。他的一句名言是:“在研究外国教育制度时,我们不应忘记校外的事情比校内的事情更重要,并且制约和说明校内的事情。”他说的“校外的事情”主要是指一个国家的民族精神。他说:“当我们倡导研究外国教育制度时,我们注意的焦点一定不能只集中在有形有色的建筑物上或仅仅落在教师与学生身上,但是我们一定要走上街头,深入民间家庭,并努力去发现在任何成功的教育制度背后,维系着实际上的学校制

^① 钟明华:《关于未来教育形态的思考》,中山大学教育现代化研究中心编《危机与挑战:教育的视野与使命——“教育与中国未来”30人论坛年会演讲集》,2010,第135页。

度并对其取得的实际成效予以说明的那种无形的、难以理解的精神力量。”^①这里所指的“精神力量”主要是指教育文化。因而，在教育研究中，器物和制度不外是教育文化的物化载体，教育文化中的价值观包括教育精神、思维定式、民族精神、价值判断等理应成为教育文化研究中的重中之重。

（四）以文化创新推动中国教育制度变革

本书研究的意义还在于，针对当下中国教育改革困局，提出由文化建设开始，推动制度变革，最终实现教育创新。

近几十年将是中国教育走向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也将是中国教育思想大变革的前夕。一般认为，制度变革是所有要素中的核心要素，然而进行制度变革有一个基础性的前提，那就是制度的变革所基于的理念及其所对应的历史文化基础，教育的改革也概莫能外。中国几千年所形成的教育文化传统的潜移默化与改革开放以来西方教育文化的强势进入，将影响甚至决定今后教育改革的方向。教育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教育离不开文化传统，教育思想、教育制度、教育内容和方法无不留着文化传统的痕迹。事实上，任何一种文化都有自我保护和抵制改变的天性。^②同样，一个民族或国家的教育文化，是经过漫长的历史逐渐形成的，在它所赖以存在的社会文化结构和功能没发生剧变的情况下，具有相对的稳定性。最显著的例子莫过于科举制度，这种把学校教育与人才选拔结合在一起的制度，并没有随着皇权统治的崩溃而销声匿迹，它被国人以教育文化的形式继承下来。

但另一方面，文化也随着整个社会生活的变化而不断地变化，文化本身也是一种自变量，人类不是传统文化的奴隶，而是文化的创造者，人们利用文化，但同时也在改造文化。教育文化也不例外。要实现深层的文化变革，

① 转引自顾明远《文化研究与比较教育》，《比较教育研究》2000年第4期，第1~4页。

② 内森·格莱泽在《解构文化》中说道，文化几乎同种族一样抵制改变。他认为把文化当作解释作用的变量引起的政治问题，差不多跟利用种族因素引起的问题一样严重。参见塞缪尔·亨廷顿、劳伦斯·哈里森主编《文化的重要作用：价值观如何影响人类进步》，新华出版社，2010，第277~288页。

必须从改变教育价值和教育观念入手,重塑教育风尚,进而变革教育行为,推动教育文化的新旧交替,创造符合时代精神的新的教育文化。本书希冀通过反思中国教育文化传统,找出当下中国教育之病因及文化症结,探究中国教育文化今后之方向,为促进教育变革、重塑教育灵魂、实现的人的自由发展这一教育现代化目标提供文化指引。

第二节 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国内学者对“教育文化”及其相关问题的研究起步较晚,间有中断,虽至20世纪下半叶得以重启并迅速展开,但其深度有待挖掘,广度仍待拓展。国外研究起步早,且学说林立,自成体系,可资借鉴,但在语言体系、研究内容、方法论等方面与国内的研究差别甚大。

一 国内研究的历史及现状

我国学界对“教育文化”的研究是随着文化研究的兴衰而起落的,可分为起步阶段(20世纪30年代)、停滞阶段(20世纪40年代至70年代)、复兴阶段(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发展阶段(21世纪以来)。

第一阶段:20世纪30年代,代表人物是蒋经三。时值国家内忧外患,许多学人欲从国外学习救国图存之道,开始翻译和介绍国外教育家的作品和思想,其中最得力者非蒋经三莫属。1929~1931年,蒋经三在当时引领教育风气之先的《教育杂志》上连续发表一系列文章:《文化哲学与文化教育学》(第21卷12期,第13~18页)、《文化教育学的理论与方法》(第21卷4期,第13~23页)、《斯普朗格^①的文化教育学》(第23卷5期,第1~15页)、《文化教育学的本质》(第25卷10期,第137~144页)、《反海爾

① 现译作斯普朗格。弗兰茨·恩斯特·爱德华·斯普朗格(Eduard Spranger, 1882-1963),德国文化教育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德国现代教育学的开创者。

巴脱^①主义者狄尔泰^②的教育思想》(第23卷5期,第1~15页)等。另外,还有著名教育家林砺儒所著的《文化教育学》、国学大师钱穆的《文化与教育》等。这一阶段的相关研究,一是数量上寥寥无几,二是内容上主要以译介德国文化教育学派狄尔泰、斯普朗格等人的文化教育思想为主,或只是对文化和教育的关系做简单的论述,甚少对教育文化做专门研究。^③但毕竟是让教育文化研究在中国落地生根,可视为教育文化研究的起步阶段。

第二阶段:20世纪40年代至70年代。整个20世纪40年代,中国先是抗击外患,后又陷于内战,知识分子们北渡南归,投身于救亡图存,无暇自顾。1949年以后,由于频繁的政治运动,30多年内“文化”在教育理论研究中付之阙如。这一阶段是教育文化研究的空白或停滞阶段。

第三阶段:20世纪80年代后期。这一阶段国内掀起了一股“文化热”,有关“教育文化”的研究文章及著作相继出现,一直持续到20世纪90年代末。作为当时教育学研究的权威杂志《教育研究》于1987年第9期刊登了顾冠华《克服传统文化与教育的负面因素》一文,拉开了“教育与文化”这一课题研究的序幕。此后,相关论文、专著随之出现,由刁培萼主编、江苏教育出版社于1992年出版的《教育文化学》是我国第一本教育文化学专著。随后,一批教育学者开始聚焦教育与文化的关系研究,如傅维利、刘民编著的《文化变迁与教育》,由四川教育出版社于1988年出版;肖川编著的《教育与文化》,由湖南教育出版社于1990年出版。也有学者对德国文化教育学派的理论进行系统的梳理与评论,如邹进所著的《现代德国文化教育学派》,由山西教育出版社于1993年出版;还有学者开始关注高等教育文化的关系,如张应强所著的《文化视野中的高等教育》,由南京师范大学

① 现译作赫尔巴特。约翰·弗里德里希·赫尔巴特(Johann Friedrich Herbart, 1776-1841),19世纪德国哲学家、心理学家,科学教育学的奠基人。

② 现译作狄尔泰。威廉·狄尔泰(Wilhelm Dilthey, 1833-1911),德国哲学家,历史学家,心理学家,社会学家。

③ 肖川:《教育文化学》,湖南教育出版社,1990,第3页。